

## 第一章

绪论：苏南农村现代化奇迹的实质



在过去的 20 年里 苏南农村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 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成功的农村现代化道路 创造了“奇迹”。‘奇迹’的发生，当然首先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苏南农村实践的结果，也是苏南农村以发展为行动导向的政府以超常规的手段发动和推行现代化的结果。是否拥有一个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有能力的和高质量的政府体系 是事关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现代化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乡镇政府，作为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府 在苏南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起了非常直接、十分具体的组织和推动作用。乡镇政府的那些作用之所以导致苏南农村现代化的成功，依赖于它具有有一种能有效地制定和实施符合苏南农村实际的各种政策、措施 权威地治理乡村社会 并适时地改革和发展自身，从而不断提高自身质量的机制。

## 一、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

### 现代化的内涵

现代化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一些经济学家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比较多的学者则倾向于把现代化定义为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 并且认为这种转变‘涉及社会各个层面’。<sup>①</sup> 以研究世界现代化进程著称的我国已故著名学者罗荣渠教授就曾指出：“广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 具体地说 这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

参见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第 6—8 页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 年。

的推动力 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 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狭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第三世界经济落后国家采取适合自己的高效率途径,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 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 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sup>①</sup> 作为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 现代化在有些地区表现为自发的 而在另一些地区可能表现为由人类自觉设计的,因此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会有不同的侧重内容 但总会拥有一些广泛出现、较为普遍的方面 那就是 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集中化、文化的世俗化和理性化。<sup>②</sup>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课题,是囊括了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全球性变革过程。它首先从西欧开始 随之通过殖民化弥散到美洲、澳洲、亚洲和非洲广大地区。因为如此 现代化在历史上又被狭隘地理解为等同于欧化、西化。<sup>③</sup> 现代化理论家认为,依据一个国家现代化起始的时间以及现代化的最初启动因素,可以将目前所有卷入现代化浪潮的国家分为两大类型:早发内生型的现代化和迟发外生型的现代化。<sup>④</sup> 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以英国、法国等部分西欧国家和美国为代表。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开始的时间都比较早,早在 16、17 世纪或 18 世纪就起步了,其现代化最初的启动力量和现代性因素都源自本社会内部,在这些国家开始启动现代化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先例存在,也就不存在从外部采借现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 95 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

<sup>②</sup> 参见张琢主编:《国外发展理论研究》第 30—42 页 人民出版社,1992 年。

参见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 2 页 上海三联书店,1995 年。

参见张琢主编:《国外发展理论研究》第 191 页。

代性的可能性，这些社会的现代化只能是其内部的现代性不断成熟的结果。而德国、俄国、日本以及当今世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迟至 19 世纪甚至更晚才开始起步的。这些国家由于社会内部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兼容关系较弱，无力从社会内部产生出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因素 因而是在英美等国现代化起步以后所产生的外部刺激下，通过人为的公共政策对现代化的前提进行补偿 从而实现现代化的 属于一种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属于一种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 它是在 19 世纪后半期遭到外来文明冲击之后才开始 其进程在 1949 年前十分缓慢。现代化精英对农村的忽视 是导致中国现代化步履艰难、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sup>①</sup> 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较为快速的现代化进程是迟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才拉开帷幕。本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功的基本经验，在于将农村现代化作为战略基点和突破口。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把农村问题放在首位 是‘ 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 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 农民没有摆脱贫困 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 ’<sup>②</sup>。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重点，也是难点。

### 农村现代化的层面

农村现代化意味着农村社会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其核心是农村工业化。虽然在理论上 现代化不等于工业化 但是现代化的过程，总是从工业化起步的。当代所有发达国家都是高度工业化国家 而所有不发达国家都是工业落后国家的事实 已使越来越多

张厚安、徐勇主笔《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的第二、三章对此作了较为细致的描述和分析，武汉出版社 1995 年。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 237 页 人民出版社，1993 年

的人同意没有工业化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断言。整个国家的工业化 应该包括农村的工业化。

所谓农村工业化，是指在农村经济结构中农业所占比例逐渐下降，工业所占比例逐渐上升的过程。它对于发展中社会来说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二元结构是发展中社会早期发展阶段广泛存在的一个典型特征 二元结构的持续存在 是造成‘有增长、无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二元结构的持续存在 是由于较‘先进’的货币经济部门通常有利于获得稀缺的生产要素，但其深层的原因却在于对城市的偏爱或者严重的城市偏向。由于发展中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口和贫困者集中于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村，城市偏向的发展效果自然很少使这些人从中受益 贫困、失业和收入不均诸问题在农村地区也就最为严重。而农村单一的农业发展战略并不能使农村居民的经济福利获得显著增长。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因此指出：发展计划应重视农村的整体发展而不单单是农业发展。那么，农村工业化能对农村发展起哪些作用呢？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关于发展中国家农村工业化问题的专家小组曾对此进行过概括 它们依次为 提供就业 使农村经济多样化并帮助农业现代化、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空间不平等。该小组认为 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域相对非常落后 失业和隐蔽失业比较严重，而布局于大城市中心的大规模资本密集型工业仅能吸收快速增长中的小部分劳动力，生计农业甚至连现有的乡村人口也不能维持。所以，农村工业化是作为在农村地域上产生非农就业的一种方式而推进的。同时，农村工业的传统部门与农业紧密联合，一个富有生机的农村工业可以通过与城市工业的联系而提供一种强有力的城乡一体化，这个部门也能有助于减小城乡地域在收入、资本和技术等方面的差距。因此 农村工业不会削弱城市工业 相反 它能够通过补充作用而加强城市工业。此外 对于发

展中国家广泛存在二元经济结构而言，农村工业化是实现农村转变的一个重要工具，它对阻止由农村向城市的痛苦迁移和缩小城乡差别具有重要作用。<sup>①</sup>

在 1949 年以后的近 30 年里，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虽然已被纳入中央政府推动下的国家现代化过程，但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城市建设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农村长时间以来单一经营农业，以至于整个农村社会除了土地等生产资源拢了大堆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和发展，也就是说农村现代化陷入了停滞徘徊。1978 年底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工业化脱颖而出并持续高速增长，从而给整个农村社会的各方面带来了巨大变化，影响了农村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组织制度结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使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但是，工业化离不开农业部门的发展。首先，工业化的速度是以农产品增长率为条件的。就农业原材料而言，这种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当农产品以一个适当的比率增加时，使用农产品作为原料的工业部门增长率才能提高。这就要求作为工业原料的农产品生产持续地保持一定比例地扩张，否则就必须花费大量的稀缺外汇从外国进口所需的原料，这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代价太大了。农业在工业化中的作用不仅仅限于这种产品贡献，还有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sup>②</sup> 农业的市场贡献表现在农业技术的进步会促进对农用工业品需求的扩大和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增长使农民收入增加，从而导致对消费工业品需求的增加

参见苗长虹著：《中国农村工业化的若干理论问题》第 36—37 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 年。

<sup>②</sup> 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第 24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

和生产的扩张。从供给方面说，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业市场剩余增加，从而为工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商品粮和原料。农业的要素贡献是指农业资源的转移，即资本和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工业化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在工业化初期，工业部门比重很小，依靠工业部门自身的积累来筹措发展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规模巨大的农业部门必然是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农业曾为工业化积累了巨额的资本。工业化初期还需要大量的劳动投入。这种需求的满足依赖于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因为城市人口在发展初期的比重很小，其自然增长满足不了工业发展对劳动的巨大需求。而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的过程中，农业生产不仅不能下降，还必须增加，因为工业的发展对粮食需求增加了。这也就必然要求农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业的外汇贡献，是指农业部门在出口创汇方面也将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因为工业化初期工业品出口能力很弱，初级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相对优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工业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工业扩张所需的许多资本品和原材料必须从先进国家进口，而这需要大量的外汇来源。农业出口就能为工业化提供外汇资金。总之，工业化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随着农村工业的发展，农业比重必然下降，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农业的基础地位显然并不能因此而改变。要防止农村工业发展起来以后农业停滞或萎缩的现象，就要依靠工业的积累来装备农业，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sup>①</sup> 农村现代化的基础是农业现代化。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998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载《新华月报》，1998年第11期。

所谓农业现代化，就是农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程。<sup>①</sup> 传统农业是以铁木制农具为主要生产工具 以人畜力为动力 实行手工劳作，生产者根据世代相传的经验和技能组织和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业。而现代农业则是发达的科学农业，它既运用现代科技和装备 又实行现代组织和管理 成为在国民经济中具有较强竞争能力的现代产业。

随着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劳动力必然要向非农业产业转移，乡村人口要向城市转移。农村城市化既是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农村城市化的推进，能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空间 对于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 以及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 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农村城市化是农村现代化的载体。因此 有些学者认为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三者之间有很强的联动性 既互相促进 又互相制约。<sup>②</sup>

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步伐的不断迈进 将导致留在土地上的农民逐步从传统向现代转化，即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民转化为为市场而生产的现代商品生产者，从而与那些已在城市化过程中从土地上转移出去的前农村人口一起，在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从这个意义上说 农村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农民现代化的过程 传统农民将“终结”。<sup>③</sup>

总之 农村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 归根结

① 郑有贵等：《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研究》第 16 页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年。

② 郑有贵等：《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研究》第 41 页。

③ [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中文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

底是人的现代化即农民现代化 它们是同步的、不可分割的。

## 二、苏南农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 农村衰败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启动了我国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从那时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已经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这 150 多年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840 年到 1949 年,长达一个世纪。这是一个封建制度逐渐解体、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在城市兴起和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产生的时期,也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在我国遭到历史性失败和忽视农村发展致使我国农村的现代化过程没有实际启动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城市工业化对农业的挤压 加速了农民的贫困和农村经济衰败 是近代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重要原因。<sup>①</sup> 处于这个时期的苏南(旧我国的江苏省南部地区 包含今天上海市郊区)虽然还是我国农业经济比较发达、农业商业化程度较高、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入侵的影响最大的地区 也并没有脱离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 农家生活资料的绝大部分仍然是自家农场所生产。<sup>②</sup> “小农农业长期徘徊在糊口的水平。”<sup>③</sup> 有学者在详尽考察了近代苏南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之后 得出结论 这里社会动荡 百姓生活不宁。战

这一分析采用了张厚安等人的观点。参见张厚安等主笔:《我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第 49—56 页。

<sup>②</sup> 参见曹幸穗:《旧我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 2、236 页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

<sup>③</sup>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文版 第 1 页 中华书局,1992 年。

争绵延 军阀混战 日寇践踏 兵匪蹂躏 盗贼遍地 农民无法安定度日。官吏暴虐 土豪横行 地租苛重 税捐竭泽而渔 榨干着农民的血汗。物价飞腾 通货膨胀 投机猖獗 农产品价格低廉 农村市场混乱 外国资本主义通过买办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 使农民再受到一次价格上的剥削。水利失修 生产萎缩 灾荒不断 内涝干旱 旱交相袭击。生态遭到破坏 血吸虫病流行 缺医少药 贫病交加 啮食着农村。文化落后 科学贫乏 求神问卜 封建迷信泛滥。村庄弥漫着饥寒 田野一片凋零。<sup>①</sup>

### 启动与挫折

中国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始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终于 197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开始全面纳入中央政府推动下的与前一百年迥然不同的国家现代化过程。在这个时期，对苏南农村的现代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通过土地改革废除农村社会的封建剥削制度，是发展中国家农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解放初，中国共产党就领导苏南农民着手进行土地改革。例如，1949 年 8 月中共苏南区党委派出农村工作团 1168 人，分 8 个队进驻吴县的 4 个区 13 个乡 进行土地改革试点工作。<sup>②</sup> 1950 年 5 月中共金坛县委选择两个乡进行土地改革试点。<sup>③</sup> 1950 年秋收之后，苏南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各地试点的基础上，以 1950 年 6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苏南行署《关于土地改革实施办法》为依据全面展开 历经宣传

参见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序第 11 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年。

② 《吴县志》第 268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③ 《金坛县志》第 167 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年。

动员、划分阶级、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颁发土地证等几个阶段，于 1951 年 11 月顺利完成。在土改中，苏南地区 31 个县市<sup>①</sup> 共没收、征收土地 10418260 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43.06%。从 26 个县（市）土地分配情况看，得益农民户数 1523982 户，占农业户数的 66.67%，得益人口 6267148 人，占农村人口的 62.34%，分得土地 8362731 亩，占耕地面积 95.28%。<sup>②</sup> 土地改革使封建剥削的基础——地主土地所有制被彻底摧毁，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从常熟、吴江、太仓等 7 个县的情况看，土改以前，占农村人口 2.74% 的地主拥有 28.84% 的土地，人均占有 20.05 亩，占农村人口 2.80% 的富农拥有 6.21% 的土地，人均占有 4.23 亩，而占农村人口 53.59% 的贫雇农，只占有 21.76% 的土地，人均占有 0.77 亩。土改后，地主、富农的土地减少，分别拥有 1.95% 和 5.25% 的土地，中农、贫雇农的土地增加，分别拥有 41.36% 和 46.58% 的土地。人均占有耕地，贫雇农为 1.91 亩，中农 2.58 亩，富农 4.13 亩，地主只有 1.57 亩。<sup>③</sup> 土地之外，耕畜、农具、房屋和家具也在重新分配之列，称作“五大财产”。土地改革使苏南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被战乱所破坏的农业经济开始恢复。例如，吴县的粮食亩产从 1949 年的 103.77 千克上升到 1952 年的 156.75 千克，总产从 1949 年的 19438 万千克上升到 1952 年的

土地改革时期，苏南全区辖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四个专区及无锡直属市，有 27 个县，249 个区，2741 个乡镇。全区可耕地为 24192670 亩，总人口约 13302036 人，其中农村人口约 11517025 人，人均耕地约 2.1 亩。参见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第 5 页，1952 年 12 月，苏州市档案馆藏。

参见中国共产党苏南区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编：《苏南土地改革文献》，第 784—785 页，1952 年 7 月，苏州市档案馆藏。

<sup>③</sup> 参见《苏南土地改革文献》第 792—793 页。

33345 万千克。<sup>①</sup> 武进县 1951 年就产粮 7.25 亿千克 恢复到解放前最高水平 ,1952 年产粮增至 8.2 亿千克。<sup>②</sup>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1951 年 苏南有 188.7 万农民参加冬学和民校学习 开始读书识字。至 1952 年 苏南农村办起了 18755 所民校 宜兴县村村有民校 无锡梅村区 88 个行政村 平均每村有民校 1.7 所。<sup>③</sup> 苏南农村各地还普遍办起了农民俱乐部 丰富农村娱乐。吴县 1950 年底有公办俱乐部 4 个 ,1951 年增加到 27 个 ,1952 年又增至 50 个。<sup>④</sup> 俱乐部的活动内容有宣传时政、文娱体育、办黑板报及组织读报组和识字班等。农村小学校的入学儿童也显著增加 ,贫雇农子弟大量入学。

但是 ,土地问题的解决不等于解决了一切问题。土地的分散耕种带来的是生产效率的低下和难以抵御自然灾害的袭击。例如 吴江开弦弓村由于土地分散 在 50 年代初人均 2 亩耕地 以家庭平均 4.5 人计算 每户只有 10 亩 耕地规模太小 所处的太湖流域又是水网沼泽地带 每年汛期常遭水灾 单家独户无法与大洪大涝抗争 有些农户劳力、农具都过剩 有些农户则两缺 各家劳力、农具的不均造成了土地利用率的 高低不平。<sup>⑤</sup> 土地由家庭单干向合作经营转变也就势在必行。

建国前 ,苏南农村许多地区历来有农忙时的“伴工”做法。1951 年春 在中共中央“组织起来 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号召之下 ,各地出现了一大批以亲邻好友为对象组成的临时性季节性互助组 和少量的在临时性互助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常年互助组。例如 ,

① 《吴县志》第 292 页。

② 《武进县志》第 254 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参见段本洛、单强 :《近代江南农村》第 661 页。

④ 《吴县志》第 959 页。

参见《江村—江镇——庙港发展的脚步》第 99 页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 年。

金坛县白塔区东崔庄村在 1951 年春出现了杨孝虎常年互助组 开始由 7 户组成 占全自然村总户数的 11.5%，翌年发展到 90%。到 1952 年 5 月 金坛全县有各类互助组 5429 个(其中常年互助组 1925 个)参加农户 48914 户 约占总农户的 65%。<sup>①</sup> 整个苏南农村有 44.96% 的农户参加了 180137 个互助组。<sup>②</sup> 随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和实施，我国的农村互助合作逐步发展为农业合作化运动。苏南的农业合作化从 1952 年春季试办了 11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到 1956 年春季初级社纷纷转为高级社而进入高潮。例如 吴县全县 1956 年 2 月建有各类农业生产合作社 829 个 入社农户达 108720 户 占总农户数的 93.9% 其中高级社 337 个 入社农户达 68353 户 占总农户数的 59.2%。<sup>③</sup> 金坛全县到 1956 年底有 90% 以上的农户加入高级社。可以肯定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我国农村继土地改革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有成效的制度变革，为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对农业合作化的要求过急 工作过粗 改变过快 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遗留问题未及时解决 以致高级社成立不久 即出现闹分社、闹退社、闹分配的“三闹”现象。吴县在 1956 年 5 月至 6 月 20 日间就发生了 37 起“三闹”事件。<sup>④</sup> 为此 各地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精神的指导下 开展了整社运动。

农业合作化立足未稳，中国农村又兴起人民公社化运动。它以迅猛之势席卷了苏南大地。从 1958 年 8 月开始的短短两、三个月内 苏南农村便全部实现了公社化。但是 公社化运动并没有给

① 《金坛县志》第 167—168 页。

参见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第 662 页。

③ 《吴县志》第 270—271 页。

④ 《吴县志》第 271 页。

人们带来想象中的共产主义和农业现代化的美景 相反 它使农村经历了一场灾难 粮食减产 农民生活降到温饱线以下 积极性受损,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继,农村发展开始陷入一个长达 20 余年的停滞徘徊时期。

明显地 从 1949 年到 1978 年的 30 年中 苏南农村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和落后 或者说经历了一场 没有发展的增长 ”农业总产出不断扩大 而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几乎全然无改进。<sup>①</sup> 高产穷县、高产穷乡、高产穷村到处都是。吴县 1956 年粮食总产 37.696 万吨 差不多是 1949 年的两倍,而农民年人均收入仅 75.1 元 ;1965 年粮食总产达到 54.165 万吨,农民年人均收入 117.5 元 ;1978 年粮食总产 70.238 万吨 农民年人均收入 136.3 元。<sup>②</sup> 直至 1978 年 农民年人均收入 无锡为 181 元 苏州为 204 元。<sup>③</sup> 在 70 年代 当时的江阴县华西大队 是全国有名的农业高产典型 在人均 9 分田里创造出了粮食亩产 1050 千克、皮棉亩产 100 千克的奇迹 人均每年劳动多达 330 余天 而人均收入也仅 300 多元。<sup>④</sup>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入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农村扮演了新时期中国现代化的启动者的重要角色 它以对传统体制的率先变革 推动了包括城市现代化在内的整个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农村自身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成就。苏南农村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短短的 20 年中 它所发生的变化尤其令人瞩目。1997 年 该地区

①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 11 页。

② 《吴县志》第 292—293、1084 页。

③ 《苏州统计年鉴 1998》第 26—27;《无锡统计年鉴 1998》,第 33 页。常州农民 1978 年的人均收入情况无可靠资料来源,估计在 110—120 元之间。

参见汪长根:《苏南农民企业家研究》第 3 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年。

(含三市市区)的国内生产总值达 2562.7 亿元,是 1978 年的 34.4 倍,<sup>①</sup>农村社会总产值达 5009.2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苏州为 4924 元,是 1978 年的 24.1 倍,无锡为 4849 元,是 1978 年的 26.8 倍,常州为 4225 元,大约是 1978 年的 35—38 倍。<sup>②</sup>

### 奇迹

1978 年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苏南农村发展的显著特点。苏州、无锡、常州在 1979—1997 年的 19 年中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速度分别达到 20.7%、21.2%和 20.0%。<sup>③</sup>

经济快速发展引起的后果是:(1)农村综合实力增强。12 个县市全部进入全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其中 1995 年有 7 个市(县)进入前 10 名。在 1991 年全国农村社会总产值亿元乡镇排序中,苏南有 69 个乡镇,江苏全省也仅 70 个,进入农村社会总产值排序前 200 名,8 个乡镇,江苏全省总共只 8 个,进入人均社会总产值排序前 20 名。<sup>④</sup>1992 年江苏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对全省 2000 多个乡镇的社会经济综合实力进行评价,结果前 100 名全部集中分布在苏南地区,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各有 50、43、7 个乡

<sup>①</sup> 《苏州统计年鉴(1998)》第 22—23 页;《无锡统计年鉴(1998)》第 30—31 页;《常州统计年鉴(1998)》,第 30—31 页。

<sup>②</sup> 《苏州统计年鉴(1998)》,第 32—33 页;《无锡统计年鉴(1998)》第 36 页;《常州统计年鉴(1998)》第 37 页。

<sup>③</sup> 苏州市国内生产总值 1978 年为 31.95 亿元,1997 年达 1132.59 亿元,无锡市国内生产总值 1978 年为 24.93 亿元,1997 年达 960.10 亿元,常州市国内生产总值 1978 年为 17.57 亿元,1997 年达 470.11 亿元。参见《苏州统计年鉴(1998)》,第 22—23、28—29 页;《无锡统计年鉴(1998)》第 31、45 页;《常州统计年鉴(1998)》,第 30—31 页。无锡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根据有关数据计算得出。

<sup>④</sup> 参见《江苏名镇志》第 787—789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年。

镇进入了这全省百强乡镇的行列。<sup>①</sup>

(2) 打破了传统的“二元结构”引起了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sup>②</sup> 一大批小城镇脱颖而出, 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大大改善, 农村产业结构的非农化和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最新权威资料显示:1996 年末 苏南农村的镇 (不包括城关镇) 个数有 322 个 占本地区乡镇总数的 79.5%。镇区占地面积 665 平方公里 平均每镇 2.07 平方公里。镇区总人口 149.17 万 平均每镇 4633 人, 其中非农业人口 92.03 万 平均每镇有非农业人口 2858 人 通公路的村、通电话的村、饮水不困难的村、通自来水的村和农民生活用煤气液化气的村占村总个数的比重已分别达 99.45%、98.15%、99.96%、48.60%、22.39% 明显好于江苏省内其他地区 指苏中、苏北地区 以下同) 农村人口仅占全省农村人口 18.9% 的苏南有 57852 个非农乡镇企业, 占全省非农乡镇企业总数的 43.5%, 高于江苏省内其他地区。在 685.09 万农村从业人员中 有 482.36 万人从事非农业, 从事非农业人员在农村从业人员中所占比重达 70.4% 也明显高于江苏省内其他地区。<sup>③</sup>

(3) 农村社会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强大的集体经济为后盾,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sup>④</sup> 教育条件得到较大改善, 完备的教育体系和优良的教学设施在全国农村处于领先地位; 医疗卫生、文化体育、新闻电视、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城镇绿化、计划生育等各类社

朱通华等著:《苏南模式发展研究》第 91 页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参见王霞林主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苏南的成功实践》, 第 4 页,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江苏省农业普查办公室关于第一次农业普查快速汇总结果公报·第一号) 载《新华日报》, 1998 年 1 月 23 日。

参见王霞林主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苏南的成功实践》, 第 23—24 页。